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高、低社会阶层的捐助行为差异

作者：孙庆洲，黄靖茹，虞晓芬，高倾德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作者探究了将捐赠行为划分为生存类和发展类，探究社会阶层与捐赠行为的关系，并排除了一系列其他解释，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以下问题与作者探讨。

意见 1：

理论上，作者探究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如何进行捐助，现有大量关于社会阶层与捐助行为，亲社会行为等的研究与之相关，请作者在理论推导部分加上。

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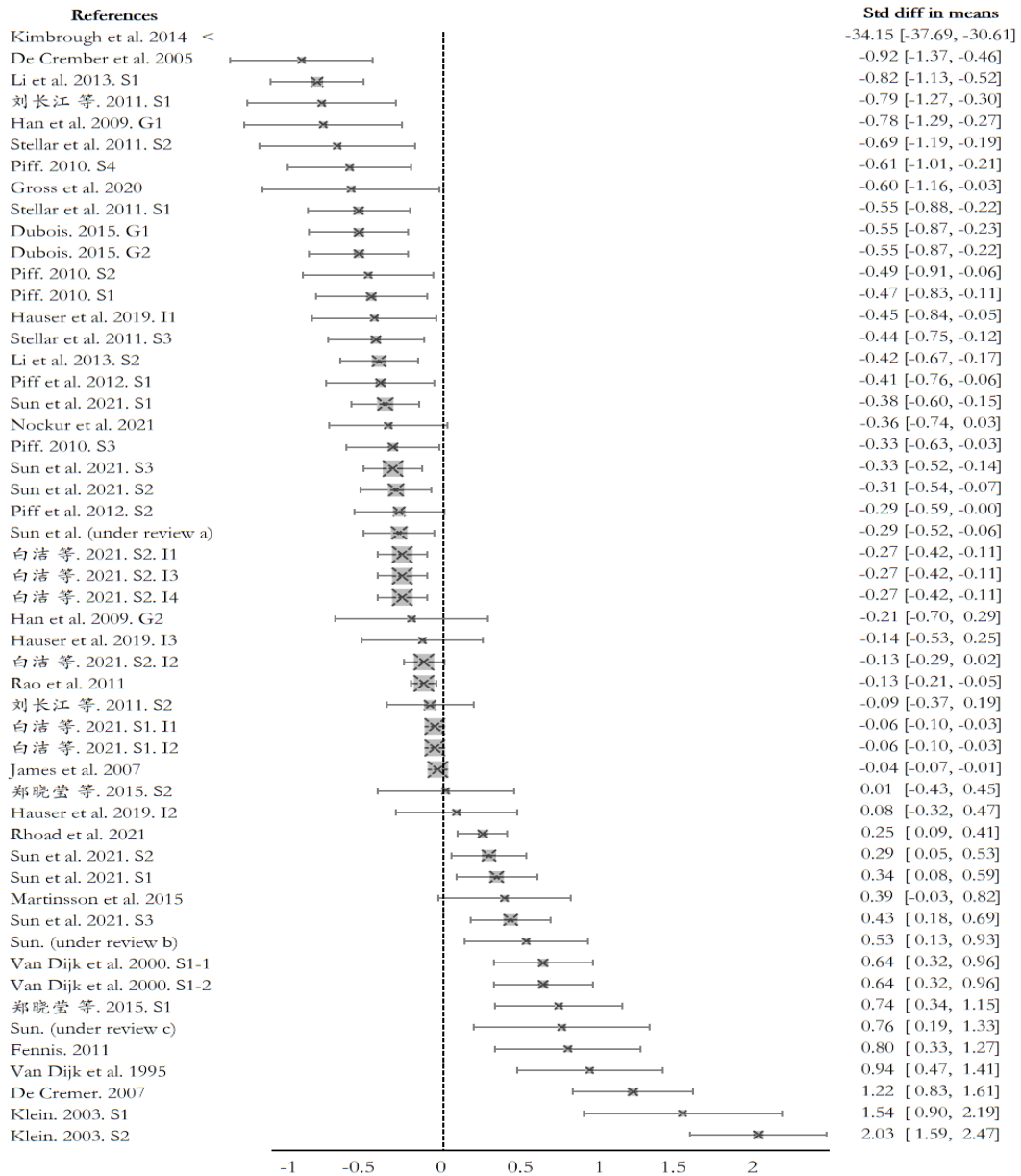
已按照您的建议在理论推导部分增补了相关文献（详见 pp17-19），感谢！此外，在 idea 产生之初，我们曾做过有关社会阶层、资源状态对亲社会行为影响的元分析，来分析造成阶层捐助矛盾或不一致的潜在原因（参见下图）。我们把这部分文献放在了引言开端部分，作为论证并引出为何要区分生存类和发展类捐助的重要依据（详见 p16），受期刊文献篇数限制，我们重点选取了 16 篇具有代表性的综述研究和实证研究。具体见下：

p16: 高、低社会阶层的捐助谁更慷慨？以往研究给出了不同答案（王阳 等, 2021; Kraus et al., 2012; Piff et al., 2017）。社会阶层负效应流派认为高阶层比低阶层的捐助意愿更低、捐助表现更差。例如，多个国家的调查报告显示，高阶层比低阶层的再分配意愿更低（白洁 等, 2021; 曾昭携 等, 2022），对社会福利的态度更保守（Page et al., 2013），用于社会捐助支出的比例更小（Duquette, 2018），在实验中向他人分配的金钱更少（Amir et al., 2018）、更不愿承担过多任务工作量来帮助遭遇困境的实验伙伴（Piff et al., 2010）等。而社会阶层正效应流派认为低阶层比高阶层的捐助意愿更低、捐助表现更差。例如，财富劣势方比财富优势方更不亲社会（De Cremer, 2007）、投入更少的慈善资源（Schmukle et al., 2019）、表现出更低的财富分享行为（Smeets et al., 2015）等。

上述相悖的研究中混杂了捐助主体向受助者提供生计维持、生活保障等形式的生存类捐助和向受助者提供能力提升、机会发展、技术改进等形式的发展类捐助（e.g., Duquette, 2018; Korndörfer, 2019; Page et al., 2013; Schmukle et al., 2019），解决上述争议的关键可能需要超越“谁的捐助更慷慨”这一传统问题（Piff et al., 2010; Korndorfer et al., 2015），进一步明晰高、低社会阶层在“授人以鱼”的生存类捐助和“授人以渔”的发展类捐助上究竟有何

差异以及是什么原因驱动了他们的捐助表现... ..

元分析图：



pp17-19 (理论推导部分)：...由于资源拥有量和社会等级的差异，高、低社会阶层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知觉模式 (Kraus et al., 2012a; Piff & Robinson, 2017)，塑造了不同的调节聚焦趋向 (Erlandsson, 2018)。资源相对稀缺和社会等级相对劣势使得低阶层者更易受到环境的限制，形成外依型(contextualism)的社会知觉模式 (Evans et al., 2005; Kraus et al., 2012b; Mittal & Griskevicius, 2014)：对环境威胁更敏感、更在意他人的想法、情绪或感受。相比之下，资源相对富裕和社会等级相对优势使得高阶层者可以较少受环境约束地追求个人目标、愿望或利益，形成内升型(solipsism)的社会知觉模式 (Stephens et al., 2011)：更关注自己内在状态、想法或感受。研究发现，受外依社会知觉模式影响、对外部环境威胁更敏感的低阶层更倾向于防御聚焦，而受内升社会知觉模式影响、对个人内在状态更敏感的高阶层

更倾向于提升聚焦（Oyserman et al., 2007）。例如，低阶层更偏好消极表述框架，高阶层更偏好积极表述框架（Erlandsson, 2018），低阶层更在意责任义务，高阶层更在意能力提升（Keltner et al., 2014; Piff & Moskowitz, 2017）等... ..

... ..由于资源的稀缺性、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相对于高社会阶层，低社会阶层有更多的“短视”偏好（Carvalho et al., 2016; 杜棠艳等, 2022; Pepper & Nettle, 2017），这是一种适应性的反应：如果当前需求急切，未来不确定、不可预测，那么获取当下可得利益比等待未来回报更有益（Frankenhuis et al., 2019; Sheehy-Skeffington, 2019）。很多研究为此提供了证据，相对于高社会阶层，低社会阶层有更多的债务（Kim et al., 2017）、更少的储蓄（Moav & Neeman, 2012）、更低的教育投入（Blanden & Gregg, 2004）、更高的延迟折扣率（Haushofer & Fehr, 2019）、更偏向一次而非分期领取退休金（Brown et al., 2015）等。

意见 2:

作者将本文的研究贡献上升到助推“共同富裕”实施中第三次分配的精准、精细管理等有重要意义”的说法有待商榷。

回应:

我们在仔细思考和讨论后，决定将研究贡献从对“共同富裕”第三次分配的助推意义改为对慈善捐助的助推意义。第三次分配更多地是社会力量在国家、政府呼吁下主动参与资源再分配的形式（如慈善事业、民间捐助、志愿者服务等），内涵上有别于本文的内容，外延也远高于本文的助推意义，初稿的表述着实有些不妥，因此，改为“慈善助推”更为准确，不知可否？

意见 3:

实证部分，作者是没有对两种捐赠方式的顺序进行随机展示的，那么这种顺序效应如何解释？

回应:

非常抱歉我们在原稿中未陈述清楚选项随机化的问题！在所有研究中，生存类捐助和发展类捐助的选项均是随机呈现的，本次修改稿中已对此补充说明（详见 p20; 23; 30; 32），感谢！

意见 4:

建议作者增加实验体现对行为的具体测量，而不是目前的行为意愿的测量。

回应:

您的建议已采纳！在新增的研究中（本稿研究三），我们通过公益配捐实验测量了真实的捐助行为而非捐助意愿，以更好地回答该问题,详见 pp26-29。

意见 5:

作者所有的 DV 都是二选一，如果是组间设计，1-7 意愿的测量是否能有相似的结果？

回应:

鉴于您和审稿专家 II 均提到该问题，我们重新设计了一项组间设计的研究（本稿研究三），将被试随机分为生存类捐助组和发展类捐助组完成单独捐助活动，以避免二择一的问题，详见 pp26-29。

意见 6:

请在所有结果上加上 error bars, standard deviation 或者是 standard error。

回应:

感谢您的建议！可能是我们没有表述清晰，导致您的误解，十分抱歉！原稿中作图均为生存类和发展类选项的选择人数占比，并非平均数，因此无法加入标准差或标准误，在本次改稿中我们对此作了细致阐述，以免读者误解。

.....
审稿人 2 意见:

本文考察了不同社会阶层个体对生存类和发展类捐助的偏好，发现高社会阶层者相比低社会阶层者更倾向提供发展类捐助，并检验了该效应的机制，即高阶层者更偏向提升聚焦，故而偏好体现提升聚焦的发展类捐助。作者还排除了需求迁移和跨期偏好两种解释。本文有助于调和以往关于社会阶层与捐助的不一致研究结果，提供了促进不同阶层人群捐助的针对性思路。整体而言，本文研究思路清晰，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有利于解决现有捐助理论关于高低社会阶层捐助偏好差异上的争议；有利于增进对高低社会阶层捐助心理的理解；有利于助推“共同富裕”实施中第三次分配的精细、精准化管理。研究设计比较严谨，得到的结论较为稳定可靠。行文逻辑顺畅，文章可读性强。此外，我还有几点意见供作者参考。

意见 1:

潜在机制 2 和潜在机制 1 是否并不矛盾？机制 2 中提到的低阶层更关注生存类需求，高阶层更关注发展类需求是否就是由机制 1 中低社会阶层趋向防御聚焦，高社会阶层趋向提升聚焦这种差异导致的呢？另外机制 1 中低社会阶层自身更在意防御聚焦，高社会阶层自身更趋向于提升聚焦，因此为他人捐助时也显示出相应的调节聚焦偏好，这背后可能也存在机制 2 中提到的需求迁移，即“我自身趋向哪种聚焦，故为你也捐助它”。作者提到研究 3 可以区分机制 1 和机制 2，但事实上操纵了项目的调节聚焦水平，被试的需求偏好也可能会相应变化，导致无法区分机制 1 和机制 2。作者可以考虑如何更好区分机制 1 和机制 2 的差异，或者考虑将其合并。

回应：

感谢您的意见！最初我们的想法和您相似，感觉调节聚焦和需求迁移之间存在关联性。但是后来仔细讨论和分析后，还是决定予以区分，主要处于两点原因：其一，从内涵上看，需求迁移反映的是捐助者是否将自身的需求迁移到为受助者捐助的行为上，而调节聚焦反映的是捐助者看待事情的动机倾向。捐助者希望事情越来越好，故而为受助者做更多发展类捐助，可能并不依赖于捐助者自身是否已满足生存或发展类需求。其二，我们在最初形成想法之前，曾做了一项捐助回溯的预调研，测量了不同社会阶层自身对生存类和发展类需求的偏好及其过去一年的生存类/发展类捐助表现，在分析中并未发现各阶层自身需求偏好与生存类捐助、发展类捐助行为的相关性，说明各社会阶层对生存类和发展类的捐助并非出自于自身需求偏好的迁移。

为了更好地区分这两个机制，在新增的研究中（本稿研究三：pp26-29），我们更为直接地测量不同社会阶层捐助者的调节聚焦倾向以及自身对生存类和发展类需求偏好，分析了两者的捐助行为的预测作用。结果显示：不同社会阶层捐助者的调节聚焦倾向显著预测其捐助行为，而不同社会阶层捐助者自身的需求偏好并未显著预测其捐助行为（虽然高社会阶层比低社会阶层有更高的发展类需求偏好、有更低的生存类需求偏好，但是在生存类捐助上，不同阶层捐助者自身需求偏好并未显著预测其生存类捐助金额；在发展类捐助上，不同阶层捐助者自身需求偏好亦未显著预测其发展类捐助金额），这可能比改变表征更能直接地区分两个机制。不知可否？

此外，您提到了初稿研究三（本稿研究四）中“操纵了项目的调节聚焦水平，被试的需求偏好也可能会相应变化”，的确有可能存在，我们在研究局限中对此予以说明（p38）。

pp28：调节聚焦解释的检验：我们同样计算了提升聚焦与防御聚焦题项得分差值，检验了其在社会阶层和捐助金额之间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在生存类捐助上，社会阶层正向预测提升聚焦倾向（ $\beta = .34, p < .001, 95\% \text{ CI} [.23, .49]$ ），调节聚焦倾向负向预测捐助金额（ $\beta = -.27, p < .001, 95\% \text{ CI} [-.41, -.14]$ ）：社会阶层越高，被试越倾向于提升聚焦，进而捐助了更少的生存类捐助（图 8-左）。在发展类捐助上，社会阶层同样正向预测提升聚焦倾向（ $\beta = .33, p < .001, 95\% \text{ CI} [.19, .44]$ ），而调节聚焦倾向正向预测捐助金额（ $\beta = .20, p = .003, 95\% \text{ CI} [.07, .32]$ ）：社会阶层越高，被试越倾向于提升聚焦，进而捐助了更多的发展类捐助（图 8-右）。进一步中介效应分析表明，调节聚焦在社会阶层和捐助偏好之间起中介效应（生存类捐助： $b = -.18(.07), 95\% \text{ CI} [-.32, -.04]$ ；发展类捐助： $b = .06(.02), 95\% \text{ CI} [.03, .11]$ ）……

需求迁移解释的检验：我们用捐助者自身标记的需求偏好去预测其为受助者资助的金额，按照需求迁移解释，高、低社会阶层会将自身的需求偏好投射或迁移到捐助偏好上：自身越倾向于生存类需求的捐助者会在生存类捐助中为受助者资助更多，而自身越倾向于发展类需求的捐助者会在发展类捐助中为受助者资助更多。该解释并未得到支持：捐助者自身的

需求偏好既没有显著预测其生存类捐助金额 ($\beta = -.10$, $p = .127$, 95% CI [-.24, .03])，也没有显著预测其发展类捐助金额 ($\beta = .04$, $p = .577$, 95% CI [-.09, .16])

p38:... ..此外，对项目调节聚焦表征的操纵也可能存在改变被试需求偏好的风险，进而影响调节聚焦机制和需求迁移机制的区分，这也有待研究设计的改进。

意见 2:

调节聚焦是个体的一种状态还是特质？从理论推导部分来看，不同社会阶层的调节聚焦取向是长期塑造而来的，似乎是一种特质。研究 2 选取真实不同社会阶层的被试，发现了对两类捐助的偏好差异，也符合特质视角。然而，其余研究均采用启动方式，操纵被试在当下的调节聚焦状态，同样发现了假设的效应。这可能表明本研究发现的效应对状态性或特质性的调节聚焦均适用。作者或可在理论部分对此进行一些说明。

回应:

感谢您的建议！的确，我们在原稿理论推导和研究二中更多地强调了不同社会阶层的调节聚焦特质，而研究三和四更多地是操纵了选项的调节聚焦表征，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我们并没有改变不同社会阶层者自身的调节聚焦状态，而是通过改变捐助选项的调节聚焦表征来符合不同社会阶层的调节聚焦特质，是一种变相的改变外在线索知觉的方式，使其与社会阶层内在调节聚焦特质相匹配。以免读者误解，依据您的建议，我们在理论部分做了补充说明，参见 p19。

P19:研究四设置了生存类需求-提升聚焦表征项目和发展类需求-防御聚焦表征项目，分离并检验了 H1 和 H2。按照调节聚焦假设，当把捐助选项用提升或防御聚焦表征时，不同社会阶层应该会选择符合其内在调节聚焦特质的选项，而按照需求迁移假设，无论调节聚焦如何变化，低阶层始终偏好生存类需求项目，高阶层者始终偏好发展类需求项目。研究五分别设置了短期导向-提升聚焦表征和长期导向-防御聚焦表征的生存类和发展类项目，分离并检验了 H1 和 H3。按照调节聚焦解释，低阶层者更偏好防御聚焦表征的项目，高阶层更偏好提升聚焦表征的项目；而按照跨期偏好解释，低阶层者更偏好短期导向的项目，高阶层者更偏好长期导向的项目.....

意见 3:

就研究结果的表述方式而言，似乎本研究关注的问题更接近“人们在两种捐助方式之间更偏好哪种”，而非“在具体某一类捐助上，高阶层还是低阶层捐助意愿更高”。由于本研究采取联合评估范式，被试对比两种选项并从中择一，而非单独评估以某一种形式捐助的意愿（如捐助金额、可能性）。有可能高阶层在两种捐助上的捐助意愿都比低阶层更高，只是高阶层在发展类（vs. 生存类）捐助上相对而言意愿值更高，导致其倾向在二者择一时选发展类捐助，而低阶层则反之。目前的实验设计无法回答相比低阶层，高阶层个体更多愿意进行

发展类捐助，还是更少愿意进行生存类捐助，还是两者皆有。需要有一个 2×2 的被试间设计，仅给被试呈现生存类捐助或发展类捐助，让其评估捐助意愿，从而回答上述问题。

回应：

您的建议已采纳！详见研究三（参见 pp26-29）。

意见 4：

研究中，被试需要对项目涉及的选项进行分类（生存类项目/发展类项目），作为后测检验。可以补充说明这里具体是让被试依据什么标准进行分类的，例如是否有给被试提供生存类项目和发展类项目的具体定义。此外，结果部分可具体报告分类正确和错误被试在因变量上的结果。

回应：

是的，在选项归类之前，我们给被试提供了生存类项目和发展类项目的定义，以便给其提供分类依据，相关内容已在正文补充（参见 p20; 23; 26; 30; 32-33），感谢！

有关项目分类正确和错误被试在捐助偏好上的对比分析，非常好的建议！我们统计了那些原有研究中归类错误的被试，一方面人数占比较少（平均约 6.54%，详见补充材料 D），可能会影响统计分析的说服力，另一方面这些分类错误的被试中有很多并非是将生存类项目归类到发展类，发展类项目归类到生存类，而是将两者归于同一类（如将生存类项目和发展类项目都归类到生存类，或者反之，这些被试占归类错误被试比例的 77.7%），由于原有研究均为组内设计的联合评估任务（生存类和发展类二选一），所以对那些将两个项目归于同类的被试做这种对比分析难以说明问题。

而在新增的组间设计研究中可以较好地对比这个问题，组间设计即使出现将两个项目归于一类的情况，也不会干扰被试单独对生存类或者发展类项目的捐助，因此，在该研究中，我们对比了项目归类正确和错误被试在捐助行为上的差异。在生存类捐助上，在正确归类的被试中（ $N = 199$ ），社会阶层负向预测捐助金额，而在错误归类的被试中（ $N = 28$ ），社会阶层正向预测捐助金额。在发展类捐助上，在正确归类的被试中（ $N = 203$ ），社会阶层正向预测捐助金额，而在错误归类的被试中（ $N = 26$ ），社会阶层负向预测捐助金额。这些结果从正反两侧面支持了阶层捐助偏好差异，说明高社会阶层更倾向于捐助“符合自己认知”的发展类项目，低社会阶层更倾向于捐助“符合自己认知”的生存类项目（详见 pp28-29）。

意见 5：

研究中，每名被试都会完成两个任务，一个是当国家征求意见时选择支持哪个项目，另外一个如果是自己有慈善经费的话会支持哪个项目。这两种任务有何不同？任务会影响研究效应的大小吗？可以考虑在每个研究中将不同任务作为一个被试内变量进行分析。

回应：

您的建议已采纳！在本次修改稿中我们先进行了整体的逻辑斯蒂回归分析，将任务类型（0=捐助政策支持意愿；1=捐助行为意愿）纳入分析模型（p21; 24; 31; 34）。我们最初设计两类任务是处于对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alpha_{\text{研究一}}=0.82$ ； $\alpha_{\text{研究二}}=0.74$ ； $\alpha_{\text{研究四}}=0.85$ ； $\alpha_{\text{研究五}}=0.86$ ），并未考虑到任务类型是否会影响本研究效应的大小，感谢您的建议。在修改稿中，我们分析了任务类型对捐助偏好的影响以及是否调节社会阶层和捐助偏好的关系，结果发现，任务类型的主效应在各研究中并不是很稳定，前两项研究中有主效应，而后两项研究中在增加了捐助选项的表征复杂度后主效应不显著。另外，我们所有研究中均未发现任务类型在社会阶层与捐助偏好之间的调节作用，说明在两类任务上，社会阶层对生存/发展类捐助的影响趋势相同。

意见 6：

研究 1、2 中，捐助内容本身可能对不同阶层偏好有一定影响。比如研究 1 中基础物资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具体实物，而职业技能培训比较抽象；研究 2 中教育物资、文具可能更多针对青少年，而医疗和粮油资源针对广泛大众。有可能是这些捐助内容本身特点促使不同社会阶层偏好出现差异。当然，研究 3、4 操纵捐助内容的调节聚焦取向有助于排除这一问题，作者可以在研究讨论中对此进行说明。

回应：

已在讨论部分补充说明（p38），感谢！

p38:在某些生存类和发展类捐助内容的设置上，如对基本物质资助和职业技能培训资助的设置，可能使人产生具象化联想的差异，对粮油礼包和文具礼包的设置，可能使人感知适助群体的差异，进而影响阶层捐助偏好，虽然在研究四、五中操纵捐助内容的调节聚焦取向有助于排除这些问题，但未来研究可设置更为对等的捐助内容加以优化... ..

意见 7：

研究 2 可以呈现完整的中介路径图，标明各路径系数。

回应：

已采纳！详见 p25; 28。

意见 8：

研究 3 的数据分析部分，在分别针对各个处理进行卡方分析之前，应先做 2×2 的分析，看调节聚焦表征是否会影响到不同社会地位对两类捐助项目的偏好。研究 4 同理。

回复：

已采纳！详见 p31; pp34-35。

意见 9:

研究 4 实验设计上短期导向与提升聚焦绑定，长期导向与防御聚焦绑定。这一设计从理论上足以分离跨期偏好和调节聚焦解释，不过仅就实验设计而言，也可能当前结果是由长期导向和防御聚焦（或短期导向和提升聚焦）的共同影响所致，即低阶层偏好长期导向与防御聚焦的组合，而不仅仅是防御聚焦本身。最理想的情况下，可以考虑 2（跨期导向）×2（调节聚焦）设计，如果只存在社会阶层与调节聚焦的显著交互，而跨期导向与其他自变量都无交互，则能更有力地说明当前效应完全由调节聚焦解释。

回应:

您的建议已采纳！在研究五中，我们采用 2（跨期导向）× 2（调节聚焦）设计补充了另外两个组合表征的条件：短期导向+防御聚焦表征的生存类项目 vs.长期导向+提升聚焦表征的发展类项目（ $N_{\#}= 215$ ）、长期导向+提升聚焦表征的生存类项目 vs.短期导向+防御聚焦表征的发展类项目（ $N_{\#}= 223$ ），排除了原来初稿简化设计中实验结果可能由长期导向和防御聚焦（或短期导向和提升聚焦）共同影响所致的猜测，研究结果表明，高、低社会阶层的捐助偏好会因调节聚焦（而非跨期偏好）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进一步支持了调节聚焦解释，而非跨期偏好解释（详见 pp32-35）。

意见 10:

研究 3 和研究 4 中操纵项目的调节聚焦或者长短期导向是否有进行相应的操纵检查？

回应:

两项研究均进行过操纵检验，详见补充材料 E 和 F。

意见 11:

摘要中有错字，“而非高、低阶层需求关注的不同产生的需求迁移”。是否应为“关注点”？

回应:

非常抱歉！已修改，感谢！

审稿人 3 意见:

本研究探讨了社会阶层对于捐赠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不同阶层个体在捐赠类型上存在差异，即高阶层个体更倾向于实施发展类捐赠，而低阶层个体更倾向于实施生存类捐赠。此外，结果发现，导致不同阶层在捐赠类型上的差异是由于调节聚焦的不同。本研究选题有意义，实验设计合理，写作逻辑清晰，然而文章目前还存在如下问题：

意见 1:

在“1.5 研究概述”部分，作者写道：“依据预研究的效应量（ ϕ 研究一（ $df=1$ ）= 0.20； ϕ

研究二 ($df=1$) = 0.17; ϕ 研究三 ($df=3$) = 0.20; ϕ 研究四 ($df=3$) = 0.20)。”预研究具体是如何实施的? 招募了多少被试, 结果如何? 这些需要更详细介绍。

回应:

您的建议已采纳!我们详述预研究的实施过程及样本量的计算过程。在每项正式研究前,先进行了一系列预研究 ($N\approx 70-80$ /项),采用与正式研究相同或相似的实验材料,调研同质样本群体,一方面检验实验材料设计的合理性,另一方初步计算每项研究中我们关注的核心变量或交互项的效应量,并依据预研究的效应量运用 G*power 软件计算了每项研究所需的样本量。考虑到期刊对引言字数限制的要求,我们将这些信息整理在了补充材料 A 中(p45),不知可否?

意见 2:

在“2.2 实验材料及程序”部分: 2.1 关于社会阶层的操纵及测量。作者写道“然后,被随机分为两组,高社会阶层组被试想象并描述自己和一位处于第 10 社会阶层人的差异,低社会阶层组被试想象并描述自己和一位处于第 1 社会阶层人的差异(类似方法参见 Yoon & Kim, 2018)”,为什么这样能有效操纵社会阶层?按照锚定效应,想象并描述自己和一位处于第 10 社会阶层人的差异不是能够提升自己的阶层?同理,想象并描述自己和一位处于第 1 社会阶层人的差异不是有可能降低自己的阶层?虽然作者进行了操作性检验,但测题——完成一项社会阶层的优劣状态感知题(1=非常劣势状态,7=非常优势状态)——能保证测量的是阶层吗?

回应:

感谢您提出此问题!在该项研究中,我们借鉴以往阶层对比的方式操纵被试的相对社会阶层感知,初稿中表述成“操纵社会阶层”确有不妥,改为“操纵相对社会阶层感知”。此外,在研究程序陈述中,我们想阐述的正是您表达的意思,非常抱歉没有表达清楚(第 10 层为最低层、第 1 层为最高层,可能数字大小与阶层高低容易产生定势干扰),本次修改中,我们将该操纵进一步阐述清楚,以免读者误解(p20)。

p20:... ..采用 2 (相对社会阶层感知:高社会阶层感知 vs.低社会阶层感知) × 2 (捐助类型:生存类捐助 vs.发展类捐助) 的混合实验设计... ..

... ..被试需要在一副阶梯图(共 10 层,从 1 到 10 依次代表从高到低的社会阶层)上标记出代表自己社会阶层的阶梯位置作为阶层前测。然后,他们被随机分为两组,高社会阶层感知组被试想象并描述自己和一位处于阶梯图中最低社会阶层的差异,低社会阶层感知组被试想象并描述自己和一位处于阶梯图最高社会阶层的差异(类似方法参见 Yoon & Kim, 2018)。接着,完成一项社会阶层的优劣状态感知题(1=非常劣势状态,7=非常优势状态),用于操纵检验。随后,完成两项捐助任务(参见图 1)

意见 3:

2.2 作者写道“填写人口统计学信息（性别、年龄）以及控制变量测项信息（平时亲社会偏好，Murphy et al., 2011；共情特质，Neumann et al., 2015）。”这里需要更详细的介绍为什么要控制这些变量，以及这些变量的测量方法。

回应:

建议已采纳！详见研究概述（p20）及研究方法部分（pp20-21）。

意见 4:

在“2.3 结果分析”部分，在统计方法上（捐赠偏好对比），作者分别独立对两个社会捐赠任务进行分析，这样似乎不妥，因为这两个任务是重复测量的。这里似乎需要采用逻辑斯蒂回归，将两个任务作为一个预测变量纳入分析。

回应:

建议已采纳！在本次修改稿中我们进行了整体的逻辑斯蒂回归分析，详见（pp21-22；24-25；31；34-35），将任务类型（0=捐助政策支持意愿；1=捐助行为意愿）纳入分析模型（p21；24；31；34）。

意见 5:

研究二中：4.1“被试”部分，需要更清晰的说明被试是如何选取的（例如，线下调查还是线上？）？样本量来自何处？

回应:

建议已采纳！详见 p22。

p22:... ..研究二通过线上平台招募被试，由于本研究对社会阶层分布取样的特殊要求，我们依据客观社会阶层指标（如经济收入、社会职业、受教育水平）对样本服务平台提出了相应的被试招募要求... ..

意见 6:

4.2 分析方法上：作者指出，“我们参照 Wang 等人（2020）将社会阶梯图中标注为 1-5 层的被试划分为高阶层组，将社会阶梯图标中注为 6-10 阶层的被试划分为低阶层组。”这里阶层是一个连续变量，为什么要划分成二分变量，这样降低了数据的效度。

回应:

在本次修改稿中我们先进行了整体的逻辑斯蒂回归分析（pp21-22；24-25；31；34-35），将社会阶层作为连续变量纳入分析模型。考虑到后续简单效应分析时为了便于读者更为直观地对比高低社会阶层的捐助偏好差异，才分了高、低组对比，不知可否？

意见 7:

4.3.同上，建议将任务类型作为一个变量纳入分析，采用逻辑斯蒂回归而不是分别做卡方。

回应:

已采纳！参见意见 4 的回复。

意见 8:

4.4 关于中介分析部分，给出更详尽的中介分析表格和图。

回应:

已补充！详见 p25; 28。

意见 9:

实验三： 5.1 详细介绍被试来源？

回应:

已补充！感谢！

意见 10:

5.2 在统计方法上，作者指出采用的是 2（社会阶层：高社会阶层 vs.低社会阶层）× 2（表征方式：提升聚焦 vs.防御聚焦）× 2（捐助类型：生存类需求捐助 vs.发展类需求捐助）的混合实验设计，那么建议采用逻辑斯蒂回归来进行统计分析，而不是拆开进行卡方检验。

回应:

已采纳！参见 p31。

意见 11:

文章中存在病句，例如，“生存类捐助指捐助者向受助者提供生计维持、生活保障等形式的各类资助。如精准扶贫中的危房改造、兜底保障项目（精准扶贫系统, n. d.），支付宝公益中疾病救助、扶贫济困项目（支付宝公益平台, n. d.）。”、“发展类捐助指捐助者向受助者提供能力提升、机会发展、技术改进等形式的各类资助。如精准扶贫中的职业培训、电商扶贫，支付宝公益中的教育助学、环境保护项目。”这两个句子的“如”字之前应该是逗号？

回应:

非常抱歉，已修改，感谢！

第二轮

审稿人 2 意见:

作者通过新增研究、更严密地检验理论假设、呈现更详实的研究结果,对我之前提出的问题均作出了合理回应,文章质量显著提升。建议接收。

回应:

感谢您的肯定与鼓励!

审稿人 3 意见:

作者很好的回答了审稿人上一轮提到的问题,一两处小问题:

1.关于社会阶层如何影响亲社会(捐赠)行为的研究综述并不完备。除了“负效应”和“正效应”流派外,还有研究认为,社会阶层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取决于特定的社会情境,如接受者所属的阶层(Kuang, Wang, & Wang, 2021)、公开情境还是私人情境(Kraus & Callaghan, 2016),建议补充上述文献。

Kraus, M. W., & Callaghan, B. (2016). Social class and prosocial behavior: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ublic versus private context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7(8), 769-777. <https://doi.org/10.1177/1948550616659120>

Kuang, Y., Wang, F., & Wang, Z. J. (2021). Social class and children's prosociality: A study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dual urban-rural structure.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12(1), 63-70. <https://doi.org/10.1177/1948550619887698>

Van Doesum, N. J., Tybur, J. M., & Van Lange, P. A. (2017). Class impressions: Higher social class elicits lower prosociali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68, 11-20.

2.建议补充关于两类捐助或助人行为(生存类捐助与发展类捐助)差异的以往研究(审稿人印象中有相关研究)。

回应:

感谢您的建议和如此 nice 的文献推荐。按照您的提议,我们在理论推导部分增补了有关情境流派的研究论述(详见 p18),补充了有关生存类和发展类捐助行为差异的相关研究(详见 pp18-19);我们不确定补充的有关生存/发展类捐助的文献是否是您印象中的文献,烦请批评指正!

p18: 解决上述争议的关键需要超越“谁的捐助更慷慨”这一传统问题(Piff et al., 2010; Korndorfer et al., 2015),进一步明晰高、低阶层在何种社会情境下捐助更慷慨。例如,情境流派发现高阶层在公开情境下更慷慨,而低阶层在隐私情境下更慷慨(Kraus & Callaghan, 2016),当受助者为低阶层时,高阶层比低阶层有更高的慷慨表现(Kuang et al., 2021; Van

Doesum et al., 2017), 这为我们提供了些许启发。除了特定的社会情境, 高、低阶层在何种类型的捐助上更慷慨? 什么原因会驱动他们的慷慨表现?

pp18-19: 上述流派忽视了捐助主体向受助者提供生计维持、生活保障等形式的生存类捐助和提供能力提升、机会发展、技术改进等形式的发展类捐助 (e.g., Duquette, 2018; Page et al., 2013; Schmukle et al., 2019), 近期研究暗示个体在食物救济类捐助 (e.g., Vieites et al., 2022) 和文化提升类捐助 (e.g., Leo, 2020) 中可能有相异的捐助意向。那么, 高、低阶层在生存类捐助和发展类捐助上是否有不同的慷慨表现?

第三轮

编委意见:

该文通过一系列实验研究高低社会阶层在捐赠类型偏好上的差异, 并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心理机制。文章从第一轮到现在不管是从理论构建还是实验验证, 都有非常大的提高。建议接收

主编意见:

该研究通过五项研究比较了高、低社会阶层在生存类和发展类捐助上的偏好差异及其潜在机制, 将捐助分成生存类和发展类比较有特色, 发现低阶层更偏好生存类捐助, 高阶层更偏好发展类捐助。但是在解释导致该差异的原因是, 低阶层捐助为防御聚焦, 不使结果更坏; 高阶层捐助时为提升聚焦, 希望受助者更好。而非高、低阶层需求关注点的不同产生的需求迁移, 亦非高、低阶层长短视导向的不同产生的跨期偏好。本来很有理论价值, 但是, 研究设计和理论推断的统计分析存在严重问题。具体问题如下:

意见 1:

2.1 的被试与实验设计部分的问题, 后面都存在需要修改或说明

描述如下: “我们采用 2 (相对社会阶层感知: 高社会阶层感知 vs. 低社会阶层感知) × 2 (捐助类型: 生存类捐助 vs. 发展类捐助) 的混合实验设计, 相对社会阶层感知为组间变量, 捐助类型为组内变量。”这个地方的描述有问题? 自变量是相对社会阶层感知, 因变量应该是捐助偏好? 只是其中描述了所谓发展类捐助和生存类捐助的有效性而已?

请在后面的类似部分, 明确研究的自变量和因变量。

回应:

我们对原稿中不合理的实验设计表述深表歉意, 感谢您的指正! 在本次修改稿中, 我们已全部修改。考虑到除研究一外, 研究二到五不算是纯粹的真实实验设计 (社会阶层只是个体

特征变量)，在这些研究中，我们不再采用几乘几的实验设计表述方式，而是直接明确了自变量和因变量，参见 pp27; 30; 32–33; 36–37; 39–40。

p27 研究一：采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自变量为相对社会阶层感知，分为高社会阶层感知和低社会阶层感知。因变量为捐助偏好，分为生存类捐助和发展类捐助。

p30 研究二：本研究中，自变量为社会阶层，通过社会阶层题项测量而来。因变量为捐助偏好，分为生存类捐助和发展类捐助。

p32–33 研究三：研究三将捐助类型设计为被试间变量，自变量为社会阶层和捐助类型，社会阶层通过社会阶层题项测量而来，捐助类型分为生存类捐助和发展类捐助，因变量为捐助金额。

p36–37 研究四：本研究中，自变量为主观社会阶层和调节聚焦表征，其中主观社会阶层通过社会阶层感知题项测量而来，调节聚焦表征为被试间变量，一种条件为防御聚焦表征的生存类需求项目-提升聚焦表征的发展类需求项目，另一种条件为提升聚焦表征的生存类需求项目-防御聚焦表征的发展类需求项目。因变量为捐助偏好，分为生存类捐助和发展类捐助。

p39–40 研究五：在本研究中，自变量为主观社会阶层、调节聚焦表征和跨期表征，其中主观社会阶层由社会阶层感知题项测量而来，调节聚焦表征为被试间变量，一种条件是提升聚焦表征的生存类需求项目-防御聚焦表征的发展类需求项目，另一种条件是防御聚焦表征的生存类需求项目-提升聚焦表征的发展类需求项目，跨期表征为被试间变量，一种条件是长期表征的生存类需求项目-短期表征的发展类需求项目，另一种条件是短期表征的生存类需求项目-长期表征的发展类需求项目。因变量为捐助偏好，分为生存类捐助和发展类捐助。

意见 2:

2.3 分析部分的前面方法部分，根本没有介绍所谓“任务类型”变量，后面的统计分析则提到任务类型？希望前后表达一致。

回应:

感谢您指出这一问题，我们已在方法部分对这一变量的由来做了解释说明。此外，考虑到用“任务类型”表述该变量不够准确，用“捐助情境”表述该变量更为贴切，在本次修改中，我们将“任务类型”改为“捐助情境”，特此说明。参见 p27。

p27: 2.2 研究程序……考虑到以往有关社会捐助的研究多从捐助政策支持意愿（对某类捐助的意见或看法）和捐助行为选择偏好（对某类捐助的选择或偏好）两方面来探测个体的捐助偏好（e.g., Alesina et al., 2018; Piff et al., 2010），本研究据此对应设计了两种捐助情境，以增加研究的稳健性。图 1-左为捐助政策支持意愿情境，图 1-右为捐助行为选择偏好情境。每种情境包含两个选项：生存类项目和发展类项目（呈现顺序随机），两个情境的内部一致

性系数为 0.82。鉴于被试在两种捐助情境下可能存在捐助偏好差异对本研究产生干扰，后续亦将捐助情境这一变量纳入统计分析（下同）……

意见 3:

文中经常提到“项目分类的后测检验：93.30%以上的被试能准确分辨生存类和发展类项目”，其实就是一个效度检验，如果研究材料和被试一致，做一次检查理论上就够了，不宜啰嗦地表达，增加篇幅。

回应:

感谢您的提议！原稿中项目分类的后测检验确实存在诸多冗余，但由于各研究中涉及的捐助情境（如研究一和二）以及题项的表征（研究四和五）均存在差异，对每项研究做项目归类检验还是有必要的。为避免篇幅冗余，我们将每个项目检验的具体分析放在了补充材料里（详见 pp28; 30-31; 34; 38; 41）。

例 p28: 93.30%以上的被试能准确分辨生存类和发展类项目，将基本物资资助和生活物资大礼包归类于生存类捐助项目，将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发展与就业书籍大礼包归类于发展类捐助项目 ($p_s < 0.001$)（补充材料 C）。

意见 4:

理论上，研究二的结果中，两个探测发展类捐助和生存类捐助应该合在一起进行回归或统计分析，而非分开统计。这个问题在后面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回应:

您的建议已采纳！在本次修改稿的所有研究中，我们将其合并报告，不再分开统计，以免冗余，感谢！

意见 5:

作者的许多研究都使用了回归分析，理论上，也应该呈现相关矩阵的结果。但是作者仍然采取 t-test、anova 和回归共同呈现的办法，本质上，方差分析是回归的特例，用回归就可以介绍了。比如性别、教育水平、平时亲社会偏好、共情特质、任务类型等都可以控制的。而作者可能习惯于实验分析思路，为了表达额外变量的控制，进行了多次的回归分析，如 P23，结果导致了許多冗余的分析结果，增加了统计二类错误发生的概率。这个部分建议全文做大修改。

回应:

您的建议已采纳！在本次修改稿中，我们提供了每项研究的相关矩阵和回归分析表，删除了原稿多种方法并用的冗余分析，除了项目归类检验外，均通过回归分析检验研究假设。

意见 6:

P26, 为什么要做“将社会阶层与平时亲社会偏好、共情特质及任务类型的乘积项放入第三层作为调节变量”。调节分析? 为什么要做调节分析? 其价值何在?

捐助偏好对比: 我们以社会阶层 (1=最低社会阶层, 10=最高社会阶层) 为预测变量, 以捐助偏好 (0=生存类项目, 1=发展类项目) 为结果变量进行分层 Logistic 回归分析, 与研究一类似, 将性别、年龄、平时亲社会偏好、共情特质及任务类型 (0=捐助政策支持意愿, 1=捐助行为意愿) 放入第一层作为控制变量, 将社会阶层放入第二层作为预测变量, 将社会阶层与平时亲社会偏好、共情特质及任务类型的乘积项放入第三层作为调节变量。

回应:

已删除这些不适当的分析, 感谢! 考虑到第一轮审稿中有位审稿专家建议检验“任务类型” (本稿中已改为“捐助情境”) 的调节效应: 社会阶层对捐助偏好的影响在不同捐助情境下是否有差异, 我们增加了脚注 2, 对此专门做了分析。参见 p29。

意见 7:

图 5 的结果, 有两个问题: 第一, 用提升聚焦得分减去防御聚焦得分是否合适? 二者本身是不同性质的倾向, 可以并存; 第二, 统计回归的方法没有明确交代; 第三, 没有控制人口学类的变量。

调节聚焦对比: 我们参考 Lockwood (2002) 的方法计算提升聚焦题项得分与防御聚焦题项得分差值, 数值越大代表被试的提升聚焦倾向越明显, 反之代表被试防御聚焦倾向越明显。然后, 对社会阶层、调节聚焦和捐助偏好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 (图 5), 结果显示, 高社会阶层比低社会阶层更倾向提升聚焦倾向, $\beta = .20, p < .001, 95\% \text{ CI} [.11, .29]$, 调节聚焦倾向显著预测被试的捐助偏好 ($\beta = .37, p < .001, 95\% \text{ CI} [.28, .46]$), 相对于防御聚焦的被试, 提升聚焦的被试更倾向于捐助发展类项目 (图 6)。

回应:

您的提议已采纳! 在本次修改稿中, 我们将提升聚焦和防御聚焦分开分析, 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将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鉴于您下一问题中提到调节聚焦作为特质类变量, 不适合做中介分析, 我们将原稿中中介效应分析的内容删除。参见 pp31-32。

意见 8:

研究三的问题, 本人认为调节聚焦解释的检验不合逻辑。因为没有实验因果先后操作调节聚焦; 第二, 调节聚焦是特质类变量, 不适合做中介。第三, 这种减法操作不合适, 前面提过, 提升聚焦和防御聚焦是两个不同的维度, 理论上不能相减。

研究三采用 2 (社会阶层: 高社会阶层 vs. 低社会阶层) \times 2 (捐助类型: 生存类捐助 vs. 发展类捐助) 的组间实验设计, 因变量为被试的捐款金额。

调节聚焦解释的检验：我们同样计算了提升聚焦与防御聚焦题项得分差值，检验了其在社会阶层和捐助金额之间的中介效应。

回应：

鉴于您的提议，我们也觉得研究三中有关调节聚焦解释的检验不够合理，再加之与研究二重复，因此将这部分内容予以删除，并在研究四和五中通过直接操纵调节聚焦对这一解释进一步检验。由此本稿中研究三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通过被试间设计单独评估不同社会阶层在生存类和发展类项目上的捐助行为差异；二是检验需求迁移假设。此外，本研究中研究设计的表述也做了相应修改，具体参考问题 1），不知可否？

意见 9：

后面的研究四和研究五都有类似上面的方法问题。

回应：

感谢！在研究四和五中，我们也在研究设计表述、项目归类检验、统计分析方法等方面做了相应修改。参见 pp36-43。

第四轮

主编意见：

经过作者的修改和完善，总体结论更加稳健，也避免了不恰当的解释或数据的过度解释，对捐赠行为的助推实践有一定的启发。表达相对比较规范，统计更加严谨。同意修改后发表。

意见：

表 5 的数据呈现，理论上，规范的做法是把控制变量放在前面，而自变量、调节变量、因变量放在后面，需要修改。

回应：

您的建议已采纳！本次修改稿的表 5 中，我们先将控制变量（性别、年龄、共情特质、亲社会偏好、脱困总额预估）放在最前，然后放入自变量（主观社会阶层、经济收入、社会职业和受教育水平）、再然后放入调节变量（捐助类型）、最后放入因变量（自身需要偏好和捐助金额），表 6 也做了相应调整，感谢！